



## 人权理事会

### 第四十五届会议

2020年9月14日至10月2日

#### 议程项目3

促进和保护所有人权——公民权利、政治权利、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包括发展权

## 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背景下的追忆进程： 过渡期正义的第五个支柱

### 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的报告

#### 摘要

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法比安·萨尔维奥利谨此提交其关于过渡期正义的第五个支柱、即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背景下的追忆进程的报告。

报告论述了与开展追忆进程并确保其不倒退的义务有关的规范性框架，分析了追忆进程在冲突和过渡情况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讨论了社交媒体上记忆军事化的问题。报告强调需要采取有力、积极和多层面的追忆政策，适当处理过去的犯罪行为，并防止其再次发生。报告最后主要针对各国，但也针对联合国提出了建议。



## 目录

|                          | 页次 |
|--------------------------|----|
| 导言 .....                 | 3  |
| 一. 特别报告员开展的活动 .....      | 3  |
| 二. 一般考虑 .....            | 4  |
| 三. 追忆进程的目标和规范性框架.....    | 5  |
| 四. 追忆工作如战场 .....         | 7  |
| 五. 冲突时期的追忆工作 .....       | 8  |
| 六. 过渡情况下的追忆工作 .....      | 10 |
| 七. 社交媒体上的记忆军事化(武器化)..... | 14 |
| 八. 渐进式追忆与防止倒退 .....      | 18 |
| 九. 结论和建议 .....           | 18 |

## 导言

1. 寻求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问题特别报告员法比安·萨尔维奥利根据人权理事会第 36/7 号决议向理事会提交本报告。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列举了 2019 年 7 月至 2020 年 6 月期间开展的主要活动，并分析了过渡期正义的第五个支柱、即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背景下的追忆进程。

2. 2019 年，特别报告员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了一次专家会议，为本报告征求意见和建议。他还组织了一次各国、国际组织、国家人权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均可参加的协商会议，让他们有机会就这个问题发表意见。特别报告员对收到的宝贵意见表示感谢。

### 一. 特别报告员开展的活动

3.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0 年 6 月 30 日期间，特别报告员发出了访问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冈比亚、大韩民国、塞尔维亚和突尼斯的请求。他感谢这些国家的积极回应。他还再次请求访问科特迪瓦。

4. 2019 年 9 月 10 日，特别报告员会见了美洲人权委员会委员安东尼亚·乌雷霍拉。

5. 2019 年 9 月 11 日，特别报告员参加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提交了关于国家赔偿方案的专题报告。

6. 2019 年 10 月 24 日，特别报告员参加大会第七十四届会议，提交了关于要求就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进行道歉的报告。

7. 2019 年 10 月 22 日，特别报告员与主管建设和平支助事务助理秘书长奥斯卡·费尔南德斯·塔兰科和保护责任之友区域间小组举行了会议。

8. 2019 年 10 月 25 日，特别报告员会见了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特别顾问办公室代表阿达马·迪昂。

9. 2019 年 11 月 20 日至 27 日，特别报告员对冈比亚进行了正式访问。

10. 2019 年 12 月 6 日至 2020 年 1 月 31 日，特别报告员召集公开协商，为本报告征求意见和建议。

11. 2019 年 12 月 10 日和 11 日，特别报告员召集专家会议，为本报告征求意见和建议。

12. 2020 年 2 月 26 日，特别报告员在纽约与会员国代表举行工作午餐，讨论了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在过渡期正义领域的作用。

13. 2020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29 日，特别报告员为编写提交大会的下一份报告召集了关于过渡期正义进程性别视角的公开协商。

14. 由于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特别报告员不得不推迟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正式访问和关于过渡期正义进程性别视角的专家会议。此外,他本要参加的几项活动也被推迟。

## 二. 一般考虑

15. 本报告述及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背景下的追忆进程,延续了特别报告员和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就历史书写和教学、<sup>1</sup> 分裂型社会追忆进程、<sup>2</sup> 防止严重侵犯人权行为<sup>3</sup> 以及档案问题<sup>4</sup> 所发起的工作。报告侧重于追忆进程在过渡期正义背景下的关键作用,这一点得到了当代国际法准则和标准的充分承认。对过去此类侵权行为开展的工作使我们能够对现在进行反思,并确定与排斥、歧视、边缘化和滥用权力有关的当代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涉及有毒的政治文化。积极开展追忆进程有助于发展尊重人权的民主文化,履行各国保障人权的法律义务。

16. 本报告力求确定各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在追忆工作方面的义务,但认定其与历史一样,虽然有明确的限制,但无法从政治影响和当前辩论中抽离出来:追忆进程绝不应让侵犯人权和/或违反人道法行为的受害人再次受到伤害,忽视或淡化他们的遭遇。

17. 报告还介绍了追忆进程的良好做法,并侧重于寻找应对三个具体挑战的办法,即冲突时期的追忆、冲突后局势中的追忆以及与政治利用社交媒体有关的记忆军事化(武器化)。

18. 这三个挑战不能孤立地看待,因为国际空间的特点是多边主义和人权体系遭到质疑,民粹主义和仇外意识在世界各地抬头,体现为种族主义、反犹太主义、仇恨穆斯林和迫害基督教徒现象愈演愈烈,而国家间关系日益紧张。<sup>5</sup>

19. 本报告赞同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的判断,即我们正在经历“关键时刻”:

多边主义受到质疑,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组织能够单独凭一己之力提出我们应对当今全球挑战所需的解决方案。地球正受到气候变暖的威胁,但也面临着国际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威胁。我们目睹对政府和政客日渐失去信心,

<sup>1</sup> [A/68/296](#)。

<sup>2</sup> [A/HRC/25/49](#)。

<sup>3</sup> [A/HRC/37/65](#)、[A/72/523](#)。

<sup>4</sup> [A/HRC/30/42](#), 附件。

<sup>5</sup> [www.un.org/en/genocideprevention/documents/advising-and-mobilizing/Action\\_plan\\_on\\_hate\\_speech\\_EN.pdf](http://www.un.org/en/genocideprevention/documents/advising-and-mobilizing/Action_plan_on_hate_speech_EN.pdf)。

对妖魔化和分裂化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声音却越来越感兴趣。在我们需要协调一致行动的时候，这种情况非常危险。<sup>6</sup>

### 三. 追忆进程的目标和规范性框架

#### A. 目标

20. 过渡期正义的基本假设是需要适当处理过去的罪行——无论是在武装冲突期间犯下的罪行，还是专制政权犯下的罪行——以便建立一个民主、多元、包容与和平的社会。承认战争罪和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对于恢复受害人的尊严和使社会重拾信心并启动纵向(公民和国家机关之间)和横向(在人民之间发生冲突的情况下群体一级)的和解进程至关重要，是对责任人的审判和刑事定罪以及对受害人的赔偿的适当补充。相反，如果不承认和惩处已发生的罪行和侵权行为，就会导致否定主义，暴力就会延续下去并得到合法化。

21. 处理所犯罪行的办法以过渡期正义的支柱为基础：没有过去的记忆，就不可能有获得真相、正义和赔偿的权利，也无法保证不会重蹈覆辙。因此，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追忆进程成为过渡期正义的第五个支柱。它既是一个自主的支柱，也是一个贯穿各领域的支柱，因为它有助于其他四个支柱的实施，是使社会摆脱仇恨和冲突思维并启动迈向和平文化的坚实进程的重要工具。

22. 在处理过去的侵权行为时，过渡期正义程序寻求促进实现不同时间框架内的若干目标：

(a) 澄清过去的侵权行为(澄清事实，刑事处罚责任人)；

(b) 应对当前的挑战(承认、尊重和缅怀受害人，提供赔偿，允许讲述，公开道歉，反对否定主义，安抚以及恢复对国家的信任和社区之间的信任)；

(c) 为未来做好准备(通过教育和提高认识防止未来再现暴力，实现和平文化)。追忆进程有助于社会民主参与，鼓励对过去的再现进行辩论，并可以对当前问题采取适当方法。

23. 2001年在德班通过的《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世界会议宣言和行动纲领》将追忆的作用解释为打击不公正的工具和和安抚手段：

牢记过去无论何时何地发生的罪行和不公正行为，毫不含糊地谴责种族主义导致的悲剧，讲述历史真相，是实现国际和解和建立基于正义、平等和团结的社会的基本要素。<sup>7</sup>

<sup>6</sup>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多边主义，可持续和平的基石”，载于 Pierre Hazan 等人(编著)的《战争与和平》，Gallimard and Fondation Martin Bodmer，2019年。

<sup>7</sup> [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Durban\\_text\\_en.pdf](https://www.ohchr.org/Documents/Publications/Durban_text_en.pdf)，第106段。

24. 追忆工作涉及奴隶贸易等很久以前发生的事件以及最近或正在进行的冲突中发生的侵权行为。

## B. 联合国规范性框架和标准

25. 各国在发生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后通过了各种文书，承认追忆在创造有利于共存的环境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26. 首先应强调保障人人享有不成为强迫失踪、任意处决、酷刑和种族灭绝等严重侵权行为受害人的权利这一一般义务。《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sup>8</sup>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sup>9</sup> 《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sup>10</sup> 和《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sup>11</sup> 都规定禁止、包括防止此类行为。

27. 经更新的《采取行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保护和增进人权的一套原则》<sup>12</sup> 规定，了解这类侵权行为真相的权利(也称为了解真相的权利)是每个受害人或其家庭成员的一项个人权利，也是一项集体权利，这项权利的“充分有效行使[……]是避免再次发生侵权行为的重要保障”。<sup>13</sup> 同一文书规定，各国义务铭记历史，并有责任传承历史，以“保留集体记忆不致灭迹，特别是防止出现修正和否定的论调”。<sup>14</sup>

28. 在许多经历过独裁政权统治或国内冲突之害的社会中，国家的这一基本义务往往仍是一纸空文：几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几乎对过去一无所知，这与当前暴力有关，当前暴力又与这些事件密切相关。

29. 路易斯·儒瓦内及其继任者迪亚娜·奥伦特利歇尔制定的经更新的《采取行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保护和增进人权的一套原则》补充了由小组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特奥·范博芬拟订<sup>15</sup> 并经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谢里夫·巴西奥尼<sup>16</sup> 更新的原则，构成了大会第 60/147 号决议通过的《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受害人享有补救和赔偿的权利基本原则和导则》的基础。

30. 在 2005 年协商一致通过的这一决议中，大会回顾，追忆进程也是获得赔偿的权利的一部分。该决议规定，抵偿应包括以下措施：核实事实并充分公开披露真相；通过正式宣告或司法裁判，恢复受害人及其密切相关者的尊严、名誉和权

<sup>8</sup> 第 1 条。

<sup>9</sup> 第 2 条。

<sup>10</sup> 第 2 条，第 1 款。

<sup>11</sup> 序言，第 7 段；实质性条款有几项针对预防义务的规则。

<sup>12</sup> E/CN.4/2005/102/Add.1，迪亚娜·奥伦特利歇尔在路易斯·儒瓦内以往工作基础上编写的报告。

<sup>13</sup> 原则 2：不可剥夺的了解真相的权利。

<sup>14</sup> 原则 3：保留记忆的责任。

<sup>15</sup> E/CN.4/1997/104。

<sup>16</sup> E/CN.4/2000/62。

利；公开道歉，包括承认事实并承担责任；追忆和悼念受害人；在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培训和各级教材中纳入关于所发生的侵权行为的准确信息。

31. 在发生过严重侵犯人权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社会中，保障人权的一般义务是追忆进程一个特殊且明确的组成部分。在这类情况下，开展追忆进程的义务来自国际人权法的主要渊源(条约和公约)和次要渊源(原则和准则)。此外，还应强调，追忆进程还作为针对所犯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新义务贯穿于全面赔偿的所有方面，特别是抵偿和保证不再发生这两个方面。

#### 四. 追忆工作如战场

32. 追忆的形式多种多样，必须成为承认差异、将所有人视为法律主体以及实现和平、正义和社会共存的一种工具。但追忆同时也是更广泛文化框架的一部分，在这个框架中存在不同的愿景、价值观和叙事论调。文化是一面棱镜，我们通过它感知世界，别人也通过它感知我们。赞扬某些音乐，歌颂某些真实、来自神话或者虚构的事件和英雄，否定其他事件，会形成看法和帮助我们定义关系。<sup>17</sup>

33. 与之相反，边缘化、排斥、负面定型观念、非人化和否定主义的思维也在恶意使用这些工具。

34. 过渡期正义的法律和规范性框架从起源到今天已发生根本变化，现在必须看到，过渡期正义进程必须将重点放在各国有效履行人权义务之上并加以发展。<sup>18</sup>

35. 国家必须根据国际标准在这一领域发挥积极和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报告员赞同美洲人权委员会建议为追忆工作制定全面公共政策的做法。<sup>19</sup>

36. 追忆作为过渡期正义的一部分，必须采取基于人权的办法，并与之保持一致。善用追忆的目的是建立“对话真理”，<sup>20</sup>也就是为在社会上就过去犯罪和暴力的起因、直接和间接责任及后果进行辩论创造条件，使其摆脱“那些截然相反且不承认已发生事件的叙述”，<sup>21</sup>从而限制“可允许的谎言的范围”。<sup>22</sup>

37. 目的是让受害民众能够解释残酷的过去，不去辩护其是否正当，从而缓解现有紧张局势，让社会能够在面对过去遗留下来的分裂的同时更加和平地共存。在

<sup>17</sup> 例如，电视连续剧《德里女孩》等虚构作品使爱尔兰和英国青少年能够更好地了解爱尔兰岛北部的冲突，而迷你电视剧《大屠杀》自 1978 年以来在国际上引起了共鸣。

<sup>18</sup> Salvioli, Fabián, “La justice transitionnelle aujourd’hui”, in Julián Fernández and Olivier de Frouville (eds.), *L’hirondelle et la tortue. Quatrième journées de la justice pénale internationale*, pp. 109-114, Paris, Pedone, 2020.

<sup>19</sup> “美洲追忆工作公共政策原则”，第 3/2019 号决议，2019 年 11 月 9 日通过。

<sup>20</sup> Sachs, Albie, *The Soft Vengeance of a Freedom Fight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sup>21</sup> 同上。

<sup>22</sup> Ignatieff, Michael, “Article on Faith”, *Index on Censorship* 5, 1996, p. 111, available at <https://journals.sagepub.com/doi/pdf/10.1177/030642209602500522>.



民主社会中，不用陷入危险的相对主义或产生同质思想，对过去暴力的不同叙述和解释就可以共存，并通过这种方式配合社会重建的进程。

38. 前两段提到的程序绝不应导致对所犯侵权行为的否认或相对化，也不应发表反对真相委员会和/或司法程序调查结果的声明，因为调查结果记录了已证实的侵权行为——这些侵犯行为的实际数字往往要大得多。侵犯人权行为受害人的声音必须在构建记忆的过程中占据特殊位置，避免可能来自行为人的操纵。

39. 在集体、部落或族裔群体之间具体的武装冲突案例中，追忆进程不能导致受害人之间出现竞争。当一些群体得到当局的支持而另一些群体却被边缘化时，就会出现竞争，原因要么是政治意愿作祟，要么是他们没有足够的政治和媒体手段在公共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40. 与武装冲突有关的追忆进程可能导致对历史的操纵和对殉难的崇拜，促使唤醒过去的创伤、加深仇恨和煽动新的暴力。《1993年至2003年期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境内犯下的侵犯人权行为盘点工作》(2010年)警告了“报复性追忆”的危险性。<sup>23</sup> 同样，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在其关于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访问报告中得出结论认为，该国不同地区的少数群体无法建造纪念碑，这在该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和痛苦。<sup>24</sup>

41. 当所传达的信息旨在以过去暴力的名义将作为受害人的人们关押起来，以便为新的暴力行为辩护并煽动新的暴力行为时，追忆工作也可能导致虐待，甚至导致所谓的“记忆暴政”。<sup>25</sup> 在存在冲突的社会中，不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经常根据他们所遭受的失败、有时候还是几百年前遭受的失败来编造故事，以调动公民情绪，激起源自羞辱记忆的复仇欲望。澄清过去的事实，承担责任，将责任人绳之以法，是对操纵过去和宣扬暴力最好的解决方法，也是实现没有有罪不罚现象的真正持久和平的基础。

## 五. 冲突时期的追忆工作

### A. 暂时性

42. 过去30年成立了数十个真相委员会以及调查和确定大规模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委员会，并设立了许多刑事法庭来审判战争罪和其他国际罪行。面对严重到“无法惩罚也无法宽恕”<sup>26</sup>的罪行时——尽管可以且必须对此类罪

<sup>23</sup> [www.ohchr.org/Documents/Countries/CD/DRC\\_MAPPING\\_REPORT\\_FINAL\\_EN.pdf](http://www.ohchr.org/Documents/Countries/CD/DRC_MAPPING_REPORT_FINAL_EN.pdf), 第111段。

<sup>24</sup> A/HRC/16/48/Add.1, 第48段。

<sup>25</sup> Todorov, Tzvetan, *Les abus de la mémoire*, Paris, Arléa, 1995。

<sup>26</sup> Hannah Arendt-Karl Jaspers, *Correspondance, 1926-1969*, letter of 17 August 1946, quoted by Claudia Hilb, “Des crimes que l’on ne peut ni punir ni pardonner. Penser avec Arendt, dans le débat sur le passé récent en Argentine”, Université Paris-Diderot, available at <http://lcspp.univ-paris-diderot.fr/Arendt/pdf/hilb.pdf>。



行绳之以法，人们认识到这些文书在教育方面的重要性及其示范意义。这些文书在预防此类罪行再次发生方面的作用也得到了强调。

43. 追忆问题是这些过渡期正义机制存在的主要原因之一；追忆具有中长期的一面，因为在大规模暴力之后，社区的民主重建进程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时间。

## B. 过渡期正义的局限

44. 然而，经验表明，完全没有立即纳入这种关于罪行的教育意义和通过批判违法行为寻求的示范作用。有许多障碍：有时在冲突持续的时候设立真相委员会和特别刑事法庭，国际犯罪继续发生，以及交战团体继续进行战争宣传。在这种情况下追忆工作是极其困难的。

45. 近年来，在中非共和国、马里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等地，在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创建了多个刑事和非刑事过渡期正义机制。在冲突持续期间，这些国家无法在所有领土行使权力，并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国家正是严重侵犯人权和/或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责任方。

46. 冲突背景下的研究和记录进程非常有价值，因为可以收集在稍后阶段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证据和证词。应当指出，新技术，特别是卫星，揭示了某些事实，例如在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事件后发现的乱葬坑以及最近在缅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苏丹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47. 然而，这些记录进程既复杂又危险。在世界各地，人权捍卫者、记者和其他记录侵权行为的人成为目标并遭到杀害。有时他们甚至被试图避免将来罪行遭到记录的行凶者以“预防性的方式”杀害。

48. 在冲突仍在进行的情况下，更难实现预防和不再发生的目标的教育层面，但一旦冲突结束，这项工作就会变得非常重要。

## C. 管理受害人的期望

49. 确认和记录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行为的能力从未像现在这样及时和有效。然而，这一至关重要的工作可能反而会加剧受害人被抛弃和无助的感觉，因为国际社会在终止这些侵权行为方面缺乏实效。在冲突期间，过渡期正义机制对待受害人需要采取适当做法。

50. 冲突时期的过渡期正义机制必须采用最佳方式处理无法满足受害人和以其名义创建的社区未能实现的期望这一问题，至少暂时应如此。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是一个创新例子：<sup>27</sup> 它采取一些有助于向受害人提供适当对策的措施，与起诉国际罪行行为人的国家司法机构合作，<sup>28</sup> 建立定期向受害人代表通

<sup>27</sup> A/73/741。

<sup>28</sup> 截至2020年1月，有12个国家向余留机制提交了41项请求。

报调查情况的程序，开展关于期望和如何最好地满足期望的研究，并确保获得作证的受害人的同意和事先同意，采取预防措施确保他们的安全。

## 六. 过渡情况下的追忆工作

### A. 自主权的挑战

51. 当最终恢复和平和/或民主时，并不总是能够实现通过过渡期正义机制实现追忆的教育目标。起诉责任人对追忆进程具有巨大价值，但国际性或混合刑事法庭作出的判决本身不足以改变社会的看法；判决往往长达数百页，而且是用普通公众不易理解的法律语言写成；有时，将其翻译成各国语文需要数年时间。

52. 例如，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在其存在的 25 年(1993-2017 年)中成功逮捕和起诉了許多人，包括国家元首、部长、将军和其他各派著名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除其他问题外，该法庭(和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通过其判例，在提高对性别暴力的认识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sup>29</sup> 并帮助提高反常事件的可见度和人们对这些事件的认识。

53. 但是，尽管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在法律上取得了不可否认的胜利，加之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罪分庭和其他国家法院开展了镇压行动，但没有改变由战争期间在前南斯拉夫社会建立的宣传机构所构建的论调，也未能遏制现今大肆滋长的否定主义和仇恨言论。

54. 从法庭的运作中吸取的一大教训是，“认为一味向公众提供关于过渡期正义机制的任务、程序和活动的技术信息就足以获得大量民众支持的想法纯属幻想”。<sup>30</sup> 法庭成立六年后才设立外联办公室，该办公室还需更长时间才能为了开展工作在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实地长期派驻工作人员。在那里，有毒的政治文化仍然抵制变革，因此真相委员会和法院不能将自己与接触社会所需的其他机制隔离开来。

55. 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在该国民主化进程已经开始时成立的；该委员会的巨大价值体现在规划和设想了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使解决种族隔离罪行成为改变南非社会种族关系不可或缺的一步。正是这一政治方法(此处的“政治”为褒义)，而非技术方法，使该委员会得以获得足够广泛的支持，包括来自受害人团体、媒体、政治家、学者、工会成员和其他人的支持，因此这种积极的发展动态最终得以吸引并保持所有人的关注。然而，该委员会没有正面解决与种族隔离政治相关的结构性暴力问题，也没有同时对那些犯下残暴罪行的人进行审判和定罪，因此受害人无法伸张正义。

<sup>29</sup> 见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Mucić* 等人案、*Kunarac* 等人案、*Šainović* 等人案和 *Dorđević* 案。

<sup>30</sup> Institute for Integrated Transitions, “Changing the Narrative: The Role of Communications in Transitional Justice”,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ifit-transitions.org/publications/major-publications-briefings/changing-the-narrative-the-role-of-communications-in-transitional-justice/changing-the-narrative-en.pdf/view>。

56. 对于追忆来说，仅有正义是不够的，没有正义也不行。这一双面例子表明，追忆活动需要在全面过渡期正义进程的框架内进行，在这一进程中所有组成部分都得到有效处理，同时不忽视实现民主与建立和平文化的目标。过渡期正义进程的执行各方必须与各种民间社会行为体结成联盟，以帮助改变暴力、对抗和边缘化的有害政治文化。为了有益促进对追忆工作的自主权，过渡期正义进程必须摆脱纯技术官僚的做法，并与民间社会结成联盟。

57. 改变德国社会的并不是战后不久的纽伦堡审判；还需要德国法院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一路积累下来的审判、后来成千上万的书籍和成千上万参观过集中营的学生，以及关于大屠杀虚构的电视剧和数十部纪录片。对于承认纳粹犯下的罪行和进行社会民主变革的努力来说，所有这一切都至关重要。

## B. 良好做法

58. 追忆工作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其他过渡期正义文书可以促进这一过程。在一些方面看，这项工作的成功取决于管理公共空间的主管部门决定和执行代表不同观点的追忆政策、与民间社会展开良好协作，并由后者采取行动以动员民众群体，启动各种倡议和辩论，并促进由民众以主人翁姿态推动的进程。

59. 开展追忆工作的一种富有成效的办法是专注于理解始终在大规模暴力发生之前既已存在的压迫和剥夺人性机制，就过去暴力的原因和后果以及建设一个全新未来的必要性展开广泛的辩论。必须让社会有必要空间，以便对导致大规模侵犯人权和/或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背景能有清醒的认识。

60. 以下陈述的例子并非是已经详尽无遗了。开展追忆的益处简直无法一言以蔽之，而追忆方式可包括文学、艺术领域、学术界、博物馆和其他方面的活动，且可以采用实际的或者虚拟(在线)的方式开展。其他方式的例子还可以有真相委员会推进的行动、为失踪人员举办纪念日以及发行学校教科书。

61. 在确定了那些受到“印第安人养恤金领取者”历史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人们所遭遇的事实之后，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sup>31</sup>便致力于鼓励社会对这段历史的反思。在利比里亚，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一项建议是推出一种“记忆图景”，以此审查赔偿方式并运行新传统形式的争端解决机制。塞拉利昂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启动了一个跨领域的国家项目，对该国的未来愿景进行广泛的探讨。阿根廷真相委员会(强迫失踪人员问题国家委员会)和刑事起诉工作推进了人们对军事独裁统治下的国家恐怖主义取得共同的认识。

62. 在不同的国家里，描述受害者经历及其失踪或死亡案情的作品纪念了被政治暴力剥夺生命的人们。<sup>32</sup> 诸如《北爱尔兰亡灵集》这样的书籍掀起了巨大波澜，甚至波及了爱尔兰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并使这两个群体得以分担各自的痛苦。

<sup>31</sup> <https://www.rcaanc-cirnac.gc.ca/fra/1450124405592/1529106060525>。

<sup>32</sup> 例如，《科索沃记忆册》，[https://www.kosovskaknjigapamcenja.org/?page\\_id=29&lang=de](https://www.kosovskaknjigapamcenja.org/?page_id=29&lang=de)，以及《北爱尔兰亡灵集》，<https://www.hotpress.com/opinion/the-northern-ireland-book-of-the-dead-417032>。

63. 多方的历史论著也探讨了当前和未来的问题，因此历史书籍对子孙后代也很重要。对于国家间的冲突，有时相对立国家的史学家能够提出相同的论点，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提出不可调和的迥异的观点。这样，各种论点的受众就须利用所掌握多种信息来源对事实自行作出解释。2006-2007 学年开始之时，法德两国作者推出了一部历史教科书出版，题为《历史》(“Histoire/Geschichte”)。<sup>33</sup> 另一本工具书是中东和平研究所出版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书籍《另一方的故事》(“Histoire de l'autre”)，<sup>34</sup> 书中第一栏阐述了巴勒斯坦人的观点，第二栏则反映以色列人对同一史实的观点，而中间留出空白的空间，供学生提出自己的论点。第三个例子是回顾 1990 年代前南斯拉夫战争的课本，其中详述了区域性事件并允许查阅极具争议性历史事件的文件资料。<sup>35</sup>

64. 民间社会在公共领域追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19 年，黎巴嫩表示需要在公共场合就该国 1975 年至 1990 年期间的流血冲突进行对话、辩论和重新追忆。当时组织了沿营地原绿色分隔线的徒步游行，并举办了内战摄影展览、电影放映和无数次的辩论会。这种热情已经超越了社区的传统分歧。

65. 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在追忆工作中起着根本的作用，因为这往往能够拆散压迫、对立和暴力的机制。其目的是用几十年后持续存在的暴力和歧视历史以取代有害而消极的政治文化。在阿根廷，民间社会和当局在艺术、媒体和公共空间领域开展了大量活动，帮助子孙后代对过去的暴力产生判别性认识。

66. 所有这些进程都必须遵守上文第 16 段对追忆行动的限定。

### C. 真相调查机制建议的后续落实和主动行动

67. 真相调查委员会最后报告所载的建议往往得不到各国的执行或宣传，从而阻碍了社会的有效主动行动。这在关于往事的讨论中留下了盲点而可能为无关乎受害者遭遇及和平社会诉求的政治利益所利用。设立过渡期正义机制不应只是为了装点门面，也不应成为规避必要改革以履行国家对受害者的义务和提高民主体制素质的借口。

68. 特别报告员在访问萨尔瓦多期间对一种持续了 30 多年的有罪不罚的政策所造成的长期后果表示关切。虽然真相委员会建议将武装冲突期间最严重罪行的肇事者绳之以法、为受害者伸张正义带来希望，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sup>33</sup> <https://www.klett.de/produkt/isbn/978-3-12-416510-7>。

<sup>34</sup> Vidal-Naquet, Pierre 等人, *Histoire de l'autre*, Liana Levi, Piccolo collection, No. 55 (February 2008)。

<sup>35</sup> [www.cdrsee.org/publications/education/volume-2-wars-divisions-integration-1990-2008](http://www.cdrsee.org/publications/education/volume-2-wars-divisions-integration-1990-2008)，以及 [www.balcanicaucaso.org/eng/Areas/Balkans/The-Balkans-rethinking-history-text-books-177099](http://www.balcanicaucaso.org/eng/Areas/Balkans/The-Balkans-rethinking-history-text-books-177099)。

有罪不罚机制还伴随着普遍而且体制化的否认、忘却过去侵权行为的制度，深刻地影响到萨尔瓦多人民的社会结构和集体论述。而在这个过程中，过去骇人听闻罪行的受害者就被遗忘、被无视。<sup>36</sup>

69. 不幸的是，这样的事例在世界上远远不是独一无二的。

#### D. 查阅文档

70. 追忆工作涉及到接触相关文档。最明显的风险是一些作战团体蓄意销毁可能对其不利的文件，或销毁可能成为严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权法的书面证据。这种隐匿真相的企图并不新鲜：一个多世纪前，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即曾下令销毁关于他当政时期在独立的国家刚果犯下骇人暴力的档案。<sup>37</sup> 从那时起，许多国家的政府都试图销毁犯罪的痕迹。特别报告员认为，保护档案是帮助社会了解真相和当家作主的关键要素。<sup>38</sup>

71. 目前对档案的保护不够充分。有些与安全机构有关联的国家机关往往拒绝与过渡期正义机制进行充分的合作，拒不允许查阅档案。摩洛哥公平与和解委员会就遇到这种情况，该委员会被拒绝查阅属于安全部门的某些档案。在萨尔瓦多等一些国家，由于拥有相关档案的主管部门不予合作，在事件发生了 30 多年后的今天，查阅有关具体罪行的军事档案仍然不可能。<sup>39</sup> 这与德国政府部门向外界开放 Stasi(即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的档案这种值得效仿的态度形成鲜明对照。<sup>40</sup>

72. 新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额外的难题。叙利亚的机制就收集了 200 多万份档案，包括与违反战争法有关的视频和证词，总数达 41TB。管理这些海量的资料需要充足的预算和专门的知识；联合国内部应制定处理这些档案卷宗程序的标准。

#### E. 联合国的作用

73. 联合国可以在追忆工作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联合国机构和机关自成立以来在其开展工作的国家建立了大量宝贵的档案。这些文件可以对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事件提供独特的视角，并有助于编写各国的史书。

74. 在联合国组织内部，其他行为体(包括人权理事会的特别程序)也不能随时触到这些档案。理论上，除了被视作高度机密的文件之外，一般在 20 年后档案即可以向公众开放，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始终如此，原因是技术、预算，而且特别是

<sup>36</sup> 特别报告员正式访问后的初步评论，见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557&LangID=S](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557&LangID=S)。

<sup>37</sup> Van Grieken, E. and Madeleine van Grieken-Tavernier, *Les archives inventoriées au Ministère des Colonies*, 21 May 1957, available at [www.kaowarsom.be/en/memoir\\_156](http://www.kaowarsom.be/en/memoir_156)。

<sup>38</sup> 一个积极的例子是，瑞士以及瑞士和平组织致力于保护一些国家的处境危险的档案。

<sup>39</sup>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557&LangID=S](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557&LangID=S)。

<sup>40</sup> 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联邦档案专员，[www.bstu.de/en/](http://www.bstu.de/en/)。



缺乏整理这些文件并转为数码化格式的资源。<sup>41</sup> 这一规则应进行修改：在某些情况下，如果有合适的情况，并且可以建立保护文档中提到的面临危险人员身份的机制，则披露过去的事件可能比遵守时限更为重要。

75. 在冈比亚，联合国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关于贾梅独裁统治时期 50 名加纳人和移民死亡的报告始终没有发表，尽管有五名联合国特别程序提出了要求，而且公开这份报告符合两国社会的最大利益。<sup>42</sup>

76. 一些社会正力图走出严重的冲突或侵犯人权和/或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镇压时期而实现苏复，而鉴于追忆工作对于这些社会的重要性，联合国应与之合作，应对其档案建立一种实用的查阅方法，以维护了解真相的权利：联合国不能回避自身作出正式规定并也要求各国遵守的一项原则和义务。

## 七. 社交媒体上的记忆军事化(武器化)

### A. 知情权与禁止煽动仇恨之间的平衡

77. 历史上，信息和追忆工作一直是关键的政治问题。媒体对于实时记载和传播重大事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西班牙内战期间德国和意大利空军对格尔尼卡开展了袭击，其间毁坏了城市，而与此同时佛朗哥的宣传却指责那是共产党人或无政府主义“炸弹手”所为，但当时允许四名记者报道了城市被炸毁的过程从而明确指出事实；<sup>43</sup> 罗伊·古特曼 1992 年 7 月在“纽约新闻日报”<sup>44</sup> 上发表的文章向外界报道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存在臭名昭著的战俘营；1994 年，媒体也实时记载了卢旺达种族灭绝事件。<sup>45</sup> 最近，路透社记者因报道在缅甸对罗辛亚人犯下的暴行而遭受了 500 多天的监禁。<sup>46</sup>

78. 另一方面，特别报告员对信息和追忆工作可能受到危险的操纵从而损害人权、以及对某些社区的污名化及由此反过来煽动暴力行为甚至大规模暴力的仇恨言论表示了极大的关切。

<sup>41</sup>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实际中很难接触到联合国掌握的萨尔瓦多真相委员会的档案。

<sup>42</sup> 见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138> 和 <https://spcommreports.ohchr.org/TMResultsBase/DownloadPublicCommunicationFile?gId=24141>。

<sup>43</sup> 有四名记者同日前往格尔尼卡：George Steer(《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Noel Monks(《伦敦每日快报》)、Christopher Holme(路透社)和 Mathieu Corman(法国《今晚报》)。

<sup>44</sup> Roy Gutman,《纽约新闻日报》,“Hidden Horror”,1992 年 7 月 19 日;“Witness tells of Serbian Death Camp”,1992 年 7 月 19 日;“For Muslims, Misery”,1992 年 7 月 21 日。

<sup>45</sup> 请特别查看 1994 年法国媒体, Marc Le Pape,“Des journalistes au Rwanda. L’histoire immédiate d’un génocide”, in Claudine Vidal and Marc Le Pape (eds.),“Les politiques de la haine: Rwanda, Burundi, 1994-1995”, *Les Temps Modernes*, No. 583, 1995 年 7 月-8 月, 第 161 至 180 页。

<sup>46</sup> [www.voanews.com/world-press-freedom/profiles-reuters-journalists-who-exposed-myanmar-atrocities](http://www.voanews.com/world-press-freedom/profiles-reuters-journalists-who-exposed-myanmar-atrocities)。

79. 歧视、种族、极端民族主义和仇恨言论正在世界各地泛滥；社交媒体上煽动暴力也很普遍，助长了社会行为的分化和激进化，包括助长了暴力行为。要应对这些问题，需要采取具体的国家行动。

80. 《关于禁止构成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鼓吹民族、种族或宗教仇恨言论的拉巴特行动计划》<sup>47</sup> 提供了指导，引导各国确保最基本的表达自由<sup>48</sup>，以及国家履行“禁止”任何构成鼓吹、“煽动”歧视、敌意或暴力的言论的义务。<sup>49</sup> 《拉巴特行动计划》规定了六项标准，以界定构成煽动仇恨的行为及据此所禁止的罪行。标准是：

- (a) 对因果关系或意图有直接影响的背景；
- (b) 发言者的立场；
- (c) 目的或意图，据此要求在言论主体、客体和公众之间存在三角关系；
- (d) 言论的内容；
- (e) 言论的范围，包括公开或非公开性质以及传播媒体；
- (f) 在仇恨言论和具体暴力行为之间可以建立直接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包括其紧迫性。

81. 特别报告员着重指出，不能以知情权或任何其他人权的名义认同鼓吹仇恨的言论。

## B. 意识形态理论倡导者和宣传者的刑事责任

82. 早在 1946 年，纽伦堡法庭即明确规定了仇恨理论意识形态理论倡导者和宣传者的责任，对反犹报纸《先锋报》(Der Stürmer)创始人尤利乌斯·施特赖歇尔判定了惩处，法庭的判决裁定，正当此人发出煽动谋杀和灭绝犹太人的言论之时，犹太人正在遭受残暴的屠杀，这一事实构成了明显基于政治和种族原因的迫害，属于《宪章》所界定的战争罪范围，构成了危害人类罪。

83.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也对千丘自由广播电台——电视台两名创始人<sup>50</sup>和该台播报员直接、公开煽动种族灭绝罪并实行迫害等危害人类罪严厉追究了责任，指出这一媒体在种族灭绝的实施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法院判定，“仇恨媒体”与杀害数十万图西人两者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84. 如果意识形态理论倡导者和宣传者散播的仇恨和歧视不受惩处，将助长一种虚假而且在道德上有害的历史记载，助长并鼓励暴力。

<sup>47</sup> A/HRC/22/17/Add.4。

<sup>48</sup>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 19 条。

<sup>49</sup> 同上，第 20 条；《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第 4 条。

<sup>50</sup> Nahimana 等人。(Media case) (ICTR-99-52), 刑事法庭余留事项国际处理机制，可查看 <https://unictr.irmct.org/fr/cases/ictr-99-52>。



### C. 媒体的责任和法律的必要相应调整

85. 国际法和国家法律需要适当应对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国界的社交媒体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科技公司所在地可能与仇恨信息的发送地和受其暴力伤害的居民所在地相距千里。

86. 缅甸问题国际独立实况调查团的最后报告认定，社交媒体及其他非计算机媒体上的仇恨言论与针对罗兴亚人的暴力行为两者之间存在着关联：

调查团收到的信息表明，线上和线下的仇恨言论与现实中的歧视和暴力行为两者之间的联系并不仅是案情造成的。在某些特定场合，在发出了某些形式教条和仇恨言论之后随即发生了暴力，而且还有迹象表明，在暴力突发前后，一般在线仇恨言论激增。这种言论形式及表象必须彻查。<sup>51</sup>

87. 本特别报告员认为，即使科技公司没有从事犯罪行为的意图，但如果它们提供的工具被用来发表可能导致或许会伤及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的暴力，则同样不能免除这些公司的责任。如果经发现因社交媒体未能尽职，从而便利和/或允许在其网络上散步煽动构成国际性罪行暴力的仇恨信息，则这些媒体没有逃避责任的理由。

### D. 假新闻

88.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大规模传播虚假消息可能促成导致民众危险地走向激进化的氛围，造成有害于共处的境况：假新闻也不例外，它是民主的绊脚石。它暴露并加剧了价值观的崩溃和社会的瓦解。因此，必须认真地处理它对公共领域的入侵，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假新闻之后接踵而至的会是悲剧、血腥事件和大规模的迫害。

89. 在不稳定的国家里情况尤其严峻，这些国家的体制往往薄弱，政治人物利用依据种族、宗教、社区甚至部族的言论并利用假新闻掩盖身份，以煽风点火，为暴力冲突铺路。据此可以轻易地对追忆和信息加以军事化(武器化)。

90. 严肃的媒体是有信息控制系统的，在其发出信息的初期对自身的产物加以控制；因此，《纽约客》杂志自上世纪 20 年代问世以来，就以其资料核实工作人员特有的严谨和纪律而闻名。但这并非当今媒体的普遍规律。近年来，随着媒体公信力的崩溃、不间断新闻报道渠道的出现，互联网的崛起以及社交网络的强大(充斥着谣言和阴谋论)，使这一现象产生了新的内涵，需要对信息进行核实。现行的核查工作未起到改变假新闻使用者和传播者的信念或行为的目的。

91. 一些国家已经制定或正试图制定使互联网规范化的规则，特别是力图消除仇恨言论和假新闻。2018 年，《加强社交媒体执法法》在德国生效，对不删除仇恨

<sup>51</sup> A/HRC/39/CRP.2, 第 1326 段。

信息的平台处以重罚。<sup>52</sup> 到 2020 年底，这项法律应受到德国政府的影响研究。在法国，《反信息操纵法》于 2018 年底颁布，但对其有效性也存在质疑。<sup>53</sup>

## E. 通讯媒体方面的教育

92. 学校的媒体和信息教育对于(必须大力)反制虚假新闻的伤害和破坏、应对媒体可信度危机以及防止国家对信息进行超越适度监管的干预而言至关重要。学生通过教育懂得了如何在表达自由的框架内，解读信息和形象，磨练他们的判别性思辨能力，形成自己的观点，掌握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中开明和负责任的公民的必备技能。<sup>54</sup> 前欧共体委员会将媒体教育列为一项要务，同时通过了主要数字平台的行为守则。

## F. 一个时代的道德风尚

93. 传播仇恨言论和虚假消息是一种大的趋势内的一些表象，这种趋势的特点是攻击多边主义和人权，以及基于民族主义的利己的排外和仇外意识形态抬头。1942 年，斯特凡·茨威格完成了《昨日世界》的写作，以批评的态度指称“我们时代的道德风尚”出于“最无理性的原因”，是“欧洲的自杀”。在存在有害道德风尚的一个时代，原本为民主和人类所不容而被视作应被人唾弃的理念和行为就得以任意发表。

94. 在《联合国打击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计划》序言中，秘书长除了谴责仇外心理、种族主义、不容忍、反犹太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和迫害基督徒事件的增加之外，还指出了令人不安的现象：

社交媒体和其他媒体被用作发表偏执言论的平台。新纳粹主义和白人至上运动正在抬头。公开辩论中出于政治目的采用了煽动性言论，对少数群体、移民、难民和所谓的“其他人”实行污名化并剥夺其人格。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也不是少数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的嘶叫。仇恨无论是在自由民主国家还是在威权政权下的公共舞台上都有一席之地。每当一种规范不再受到尊重，我们共同人性的所有支柱都将动摇。<sup>55</sup>

95. 根据联合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其他人道和人权组织、独立媒体，甚至普通公民的记载，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等持续发生冲突的地方，许多医院、学校和其他受保护地点受到轰炸，显示出对国际法的全然无视；然而，对这些暴

<sup>52</sup> 见 [www.lemonde.fr/pixels/article/2019/07/04/lutte-contre-la-haine-en-ligne-l-impossible-bilan-de-la-loi-allemande\\_5485218\\_4408996.html](http://www.lemonde.fr/pixels/article/2019/07/04/lutte-contre-la-haine-en-ligne-l-impossible-bilan-de-la-loi-allemande_5485218_4408996.html)。

<sup>53</sup> 可查阅：  
[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cidTexte=JORFTEXT000037847559&dateTexte=&categorieLien=id](http://www.legifrance.gouv.fr/affichTexte.do?cidTexte=JORFTEXT000037847559&dateTexte=&categorieLien=id)。

<sup>54</sup> 例如在法国，通讯与信息媒体教育中心，[www.clemi.fr/](http://www.clemi.fr/)。

<sup>55</sup> [https://www.un.org/en/genocideprevention/documents/advising-and-mobilizing/Action\\_plan\\_on\\_hate\\_speech\\_ZH.pdf](https://www.un.org/en/genocideprevention/documents/advising-and-mobilizing/Action_plan_on_hate_speech_ZH.pdf)。

行和抗议活动的揭露并没有改变交战团体的行为，<sup>56</sup> 也没有促使安全理事会采取适当的干预行动。

## 八. 渐进式追忆与防止倒退

96. 渐进是一项从个人角度贯穿于国际人权法的原则。<sup>57</sup> 追忆进程也需要渐进发展：必须推进对真相的追查，并积极确定对于已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事件的追忆政策。这些政策需要在所有各级建立正规和非正规教育方案，既作为一项人权义务，同时也是为了通过和平文化防止今后发生侵权事件。同样，还必须在今后的追忆进程中纳入性别问题等涉及人权的当代视角，并重新审视目前尚未考虑到这一点的追忆进程。

97. 倒退或扭转也同样不可行：对于否认过去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种族灭绝和其他危害人类罪等灭绝政策以及洗白或赞扬实行这些政策的政权的行为，必须予以全面谴责并认定无法接受。各国政府和其他公共当局不得发表此类违反道德和国际义务，使受害者再次受害，并与国际社会相抵触的言论。特别报告员对巴西总统为蹂躏巴西的军事独裁辩护并质疑真相委员会报告的声明深表关切。<sup>58</sup>

98. 从这个角度看，设计和实施的任何追忆政策都不得扭曲或削弱为澄清事实而建立的合法机制(真相委员会)和/或对责任人进行审判和定罪的法庭所做的结论。

## 九. 结论和建议

99. 在遭受严重侵犯人权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之害的社会中开展追忆进程的义务来自于国际人权法的主要和次要渊源，因此，各国政府不能以预算、政治、结构或相关理由回避这一义务，将工作重点挪到过渡期正义的其他领域。

100. 过渡期正义系统需要采取基于人权办法的有力和积极追忆政策，适当处理独裁或威权政权过去所犯罪行，或在武装冲突背景下所犯罪行。如果不进行追忆，获得真相、正义和充分赔偿的权利就无法充分实现，也无法保证侵权不再发生。

101. 对严重侵犯人权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追忆进程是过渡期正义的第五个支柱。

<sup>56</sup> [www.icrc.org/en/document/yemen-attacks-health-care-facilities-must-stop](http://www.icrc.org/en/document/yemen-attacks-health-care-facilities-must-stop)。

<sup>57</sup> Salvioli, Fabián, “La perspectiva pro persona como método hermenéutico para la aplicación d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in Jon-Mirena Landa Gorostiza (ed.), *Retos emergentes de los derechos humanos: ¿garantías en peligro?*, pp. 31–41, Valencia, ed. Tirant lo Blanch, 2019 年。

<sup>58</sup> 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抨击了真相委员会的工作，后者揭示了军事独裁政权犯下的 443 起谋杀和强迫失踪案件。见特别报告员的新闻稿：  
[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431&LangID=E](http://www.ohchr.org/EN/NewsEvents/Pages/DisplayNews.aspx?NewsID=24431&LangID=E), and Naiara Galarraga Gortázar, “El presidente Bolsonaro cuestiona la verdad oficial sobre la dictadura de Brasil”, 《国家报》，2019 年 7 月 31 日，  
[elpais.com/internacional/2019/07/30/actualidad/1564516182\\_689279.html](http://elpais.com/internacional/2019/07/30/actualidad/1564516182_689279.html)。

102. 追忆进程补充而不是取代真相、正义、赔偿和保证不再发生的机制。启动追忆机制绝不能成为严重侵犯人权或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责任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不受惩罚的借口。

103. 渐进是一项从个人角度贯穿于国际人权法的原则。追忆进程也需要渐进发展，顾及不同受害者群体并以适当的性别视角推进对真相的追查，同时有效制定关于过去侵权行为的追忆政策。对追忆进程适用不倒退原则可以限制试图否认过去侵权行为和受害者所受伤害严重性的否定或修正论调。

104. 追忆是一个长期进程，国家必须发挥积极和果断的作用。追忆政策的决策和实施当局应确保此类政策充分反映受害者意见，而且是与民间社会、特别是人权组织合作制定。

105. 关于追忆的公共政策要有多个层面，除其他外，应包含与公共空间(纪念碑、公园、广场等)、艺术表达(博物馆、戏剧、音乐会、画展等)、媒体宣传、展示活动以及政府在重要日子的公共行动有关的措施；在教育层面，此类政策需要有面向所有各级正规和非正规教育的方案，并建立一种和平文化。

106. 追忆进程还作为各国针对所犯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新义务贯穿于全面赔偿的所有方面，特别是抵偿和保证不再发生这两个方面。

107. 追忆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所界定的过去，为反思现实并查明往往与有毒政治文化相关联的排斥、歧视、边缘化和滥用权力所涉及的当代问题提供了机会；追忆有助于发展民主文化和尊重人权。

108. 善用追忆的目的是建立“对话真理”，也就是为在社会上就过去犯罪和暴力的起因、直接和间接责任及后果进行辩论创造条件。追忆进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否定或试图减损经真相委员会和/或法律程序认定的侵权行为和罪行。这种似是而非利用追忆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也违背了国际人权义务。

109. 侵犯人权行为受害者的声音必须在追忆进程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也有助于挫败否定和/或修正企图以及侵权者和试图恢复暴力的政治团体或利益攸关方的花招。公共当局必须避免发表洗白侵权行为并使受害者再次受害的否定言论。

110. 冲突后局势下的追忆进程旨在使受害民众能够认识残酷的历史，避免复仇情绪，接受以往分歧，谴责所犯罪行，珍视正义机制，并通过经验教训缓解当前紧张关系，使社会从此得以和平地生活。

111. 追忆、特别是记录冲突期间的罪行和侵犯人权行为极为重要，但需要妥善对待受害者，让他们成为这一进程的主要行为体，经常向他们通报情况，只要暴力仍在继续，就尽可能适当满足他们的期望。

112. 过渡期追忆进程只有秉持民主化与和平文化的政治目标才能有效。过渡期正义机制的推动者应与各种民间社会行为体结成联盟，为改变政治暴力、对抗或边缘化的有毒文化作出贡献。

113. 保护国家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特别是人权组织)的档案对于追忆进程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应允许按照既定标准查阅档案,各国政府应移除查阅档案的障碍。

114. 联合国应建立分享自身档案的程序,这对于澄清许多社会的历史,从而帮助维护了解真相的权利非常重要。具体而言,应建立一种高效的查阅方法,按照调查目的确定优先次序,使社会能够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历史。

115. 应调整国家立法以反映技术进步。不得以社交媒体是传播实体为借口接受导致暴力的仇恨言论。表达自由必须得到保障,但构成煽动仇恨的犯罪行为必须予以禁止,对歧视、敌对或暴力行为的责任人必须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惩罚。小学、中学和大学的正规教育应包含媒体和信息教育,让学生们能够在充分尊重人权的情况下进行信息分析、培养敏锐批判能力并形成知情的见解。